

太原城里的杏花岭

马绍民

到2025年,杏花岭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建制出现只有27年,作为一个乡街级行政建制出现已有70年。

1955年,太原市原北城区设立了18个街道办事处,“杏花岭街办”是其中之一。过了6年,杏花岭街办改称“杏花岭人民公社”,然后直到1979年,再次复称街道办事处。

然而杏花岭作为一处园林大观出现,历史已经超过600年了。

无论是27年前的杏花岭区,还是近70年前的杏花岭人民公社、杏花岭街办,或是600多年前的杏花岭园林,反正这是一个会让人与“灿若云霞”“美酒盈觞”“林表霁色”等诗意表达联系在一起的城名。

杏花岭的历史炊烟

明朝初期,出生在南直隶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第一代晋王朱橞,最早为汾河东岸这片地势起伏的土地植入绵绵江南诗意。其后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太喜爱、太珍视杏花岭这个名字了,使得这株600年前就绽放的华美古杏,至今嫣红芬芳。

但是在当时,现在的杏花岭区的这片区域还属于明朝太原府治下的阳曲县。那时的阳曲县衙在如今的府西街中段,因此府西街这片地方在当时被称为“县前街”。

从地缘赅续这个角度论,杏花岭人身为“阳曲人”的历史,可以上溯到距今1000多年的北宋初年了。

阳曲县在西汉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马绍民,中国少儿电影学会会员,杏花岭区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创作有《铜牌小车手》《空火车》《小号手》《大号小兵》等影视剧本,著有文史散文集《古典太原 杏花一坡》。

那时阳曲虽属太原郡管辖,但故地在今忻州市的定襄县境内。2000多年的古县以“阳曲”为名,是因为潞沱河在这里拐了一个优美的大弯,地处潞沱河“曲水之阳”。

西汉阳曲县,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朝廷废除了。东汉末年,曹操统一北方后重建阳曲县。可以说,曹操让阳曲与太原府城的联系变得紧密起来。

晋、隋、唐三朝,阳曲一会儿改为“阳直”,一会儿改为“汾阳”,一会儿又改回老名字“阳曲”,治所县衙也从阳曲镇搬到木井城(今阳曲县东黄水故县村)。名字来回变,地方不断搬,一会儿拆一会儿合,倒腾来倒腾去,把方志专家们都整晕了。这时候的阳曲,与杏花岭人在地域血缘上还没有任何关联。

两者产生历史交集,要等到公元979年才会出现。那年,宋太宗赵光义把晋阳古城焚毁后,紧接着实施了一个看人下菜碟的移民政策:他把城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迁往帝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没钱的穷老百姓都赶到邻近的榆次。

过了没多久,大败于契丹的赵光义便察觉到不妥。他坐在驴车上仓皇逃命时,心中涌起悔意。晋阳城毁了,北方的重镇没了,中原的北大门洞开,一直觊觎中原的草原铁骑此刻便能策马扬鞭,直逼东京。如梦初醒的赵光义,随即命令驻守太原并代履行行政职务的大将潘美火速新建一座太原城,以期亡羊补牢。

至于潘美新建的太原新府城为什么要在汾河东岸选址,除了一些深层次因素外,仅从城建施工来说,为应对十万火急的防务压力,用最短时间、最少资源建起一座以镇成为主要功能的城池,是一个含糊不得的刚性指标。这么说来,最大限度地利用汾河东岸现有村寨坞堡、军事营垒、房屋宅邸、旧构城垣等现成设施修筑新城,是最经济、最现实、最聪明的选择。

根据史籍记载,潘美将军动工开建河东太原城那时候,汾河东岸今杏花岭区域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开发建设,至少存有唐明监、故军、唐明镇、唐明村、晋文公大庙等一批旧有建构。虽然这个区域的城建规模远不能与赵光义毁掉的“晋阳三城”相提并论,但其物质基础和各种城建资源,已经可以支撑潘美将军用最短的时间完成新城修建任务。河东太原城建好后,阳曲县衙门就从今东黄水一带搬到太原城来了。但是因为潘美修筑的北宋太原府城实在不够宽敞,军政机关又多,阳曲县衙门一时还无法在城内找到地方,而只能暂时落脚在西门之外。

就在这个时间段,阳曲县成了太原府的“附郭”。什么是“附郭”?就是古代那些没有独立县城而将县治城郭附设于京城、府城、州城的县。这样的县,管辖范围不大,治理的基本就是京城、府城、州城和近郊一小片地方。

而唐明镇,在今杏花岭区西羊市一带,唐明镇的“镇”,不是城镇的“镇”,是边防军队建制,而不是行政建制。这个“镇”,特指军镇,是镇戍、镇压之镇。为什么叫“唐明镇”呢?唐明这个词,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时间概念。这表明,在唐玄宗时期,这里就已经是大唐一个相当重要的军镇了。唐玄宗的谥号是“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加上白居易在妇孺皆知的《长恨歌》里用“汉皇”借指唐玄宗,因此自晚唐开始,民间就把唐玄宗称为“唐孝明皇帝”或者干脆称“唐明皇”了。

要问营盘为什么扎在河东而不在河西,道理也很简单。第一,公元702年张嘉贞担任并州长史时,太原驻有正规军3万多人。几万人的军队需要骑马操练、拉弓射箭,当然不会与老百姓混杂驻扎在河西晋阳城内或者附近区域。第二,军队驻扎在地势高平开阔的汾河东岸,距石岭关险要比较近便,兵马粮草不需要费时费力从河西渡河运送,兵出井陉关十分迅捷便利。

驻扎数万军队,除了要修筑守卫指挥机关的坚固城堡,也要修建供士兵住宿的军营和演武的校场;将士们余暇还需要逛街购物、喝酒娱乐,甚至进寺庙获得精神抚慰。那么,为军队和士兵提供各种军事、生活服务的工商百态,就自然兴起并聚集在唐明镇四周。于是,数量众多的老百姓聚集成“村”。

唐明镇附近的这个村依军镇取名,就叫“唐明村”。

而历史似乎还可以往前溯。太原一直都是兵家重地,汾河东岸的屯兵史似乎也能上探到汉朝。证据正是位于今杏花岭区辖内西缉虎营街的普光寺。据载,这座普光寺始建于东汉建安年间。这个时期,佛教刚刚由天竺传入中土,庙宇势必会修建在有人居住的地方以利传播,而不是像后世那样远避深山老林与松风泉声为伴。

根据这两点可以说,在东汉时期,今杏花岭区普光寺缉虎营一带就有一定数量的百姓定居或者军队驻扎。尤其是那些黎民百姓,他们在汾河畔筑起村落,放牧牛羊或躬耕陇亩,西面汾河可捕鱼虾,东面东山可樵柴薪,在这个很有可能就叫“普光寺村”居住的村民,为今天的杏花岭区点燃了1800年前的历史炊烟,从而让我们脚下的土地变得更加底蕴厚重。

杏花岭的门和关

杏花岭区是太原府城的重要组成部分,遗留有大量古地名。比如“小北关”“大北门”“小北门”“大东关”“大东门”“小东门”等,这些地名时而“大”时而“小”,既有“门”又有“关”,往往让人感到困惑。

还得从北宋潘美修的太原城说起。潘美构筑的太原城,南北长、东西窄,上头宽、下头窄。河东府城的四至范围,大致是北至今杏花岭区的缉虎营街、早西门街,南至今迎泽区的铁匠巷,东至今迎泽区的柳巷和杏花岭区的上肖墙,西至今太原市城西水系。城墙开了4座城门,北门叫“怀德”、南门称“开远”,东门谓“朝曦”、西门为“金肃”。

“怀德”,语出《论语》,意思是感念恩德。北为上,表达出对皇帝的忠心;“开远”,着眼太原所处的地理位置。太原三面环山一水中流,只有南面开朗寥廓,可获时雨新风;“朝曦”好理解,东门最先迎接初升的太阳,向阳花木,难老永生;“金肃”,金在五行中方位属西,肃,凛然严整之意。看我镇守北陲,哪个蠢贼敢犯?

名字起得真好。“怀德”,是太原城的品质;“开远”,是太原城的志向;“朝曦”,是太原城的精神;“金肃”,是太原城的使命。

潘将军造的城,从地图上看,北门和南门还基本处在一条直线上,东门和西门就对不上了。加之周城内还有一个不小的子城,当不当正不正摆在那里,导致城内的“官街”根本形不成直达四方的大十字框架。元好问怪不得在诗中发泄了一通“官街十字改丁字、钉破并州渠亦亡”的愤怒。

元好问生气有道理,但潘美也有他的苦衷。潘将军修城是“急就章”,没时间做详细规划,也来不及拆除汉唐以来留下的一批古建筑。其实他不仅不能拆,还必须充分利用这些既有建构,才能在很短时间里修起一座满足军事卫戍需要的城池。

潘美不是不知道,太原作为“四战之地”和“北边重镇”,一直处在抵御北方各种势力轮番侵扰的最前沿;他也不是不知道,假如河东新城建得过小,势必缺乏防御能力和生存回旋余地。

潘美死后,朝廷派阳曲人张永德接替潘美,全面负责太原的军政事务。

作为本地人,张永德对太原城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和加强防御的紧迫性比谁都了解。

他回来一看,感到河东新城实在太憋屈。被宋太宗毁掉的晋阳城,城周长四十二里、城墙高四丈。河东新城周长才十里多一点儿,连古城四分之一体量都不到。这能存多少粮食?能容多少兵马?弹丸之城,难当大任,得赶紧想办法强化城防。

螺蛳壳内做不成道场,文章只能在城外做。张永德的决定是:尽快建设“关城”。

很多人不太清楚“关城”“瓮城”和“月城”。

瓮城,是在城门外侧或内侧另砌一圈带城门的城墙,用来屏蔽城门的闭合性构筑物,好比为城门加装一副铠甲。月城和瓮城的性质一样,略有区别。《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后有注释说:“月城者,临水筑城,两头抱水,形如却月。”意思有的城池靠近江河,城门外的月城两头接水,形成对城门的拱卫关系。

关城是围绕城门在城外新开辟出来的一座小城,比瓮城、月城规模大多了。关城不仅有城墙、有城门,里面还驻扎着军队、居民、店铺、市井百业,是一座缩小版的城池。

瓮城、月城着眼增强城防强度,而关城在此基础上,更着眼拓展城池的面积和增加城池的容量。因为城池越大,拥有和储备的人财物力等资源就越多,抗打击能力和自我生存能力就越强。

张永德会先修哪座关城呢?

西门外有汤汤汾河,是一道水势湍急的天堑。相对单薄的是北门、南门和东门,存在严重的防守问题,特别是南门外地势平坦如砥,极易被辽军攻破。

于是张永德最先建设的是南关城。《永乐大典》引述《太原志》说:“南关城,宋淳化三年(992)筑,东西接府城之两隅,以处屯兵。东关城、北关城,亦淳化中所筑。”

张永德建造的南、东、北3座关城,使河东太原府城形成了双重城防结构。

后来发现,东关城的战略意义更大。出了朝曦门,就是地势较高、林草茂密、沟壑纵横的东山。这个地形,利于入侵者藏匿和调动兵力,利于敌军居高临下发起攻击。而有了宽阔的东关城,东山和太原城之间就设立起一大片缓冲地带,大大减轻了东门防御的压力。

从张永德开始,东关城或东门外一直都是屯军防御、重兵把守的要地,宋代以降,概莫能外。既控东山,可取太原,东山是太原的命门。解放战争时,人民解放军和阎锡山的队伍围绕东山要塞反复厮杀,伤亡惨重。

几座关城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府城城域面积,有助于城市各业的发展。

太原人应该记住张永德,是他进一步完善了河东太原府城,并为明代谢成和朱橞扩建太原城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城建参照。

明晋王朱橞就藩太原前,谢成先来太原打前站,为女婿修建晋王府。晋王府一竣工,他马不停蹄开始扩建太原城。谢成在潘美和张永德的基础上,把存在了400多年的太原城池向南、向北、向东大幅扩展。

谢成比潘美、张永德两人幸运多了,他拥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实现了对已经残破不堪的太原府城天翻地覆的改造:

他推平了东门外的金鸡岭、松花坡、桂子山,把东城墙从今柳巷和上肖墙的位置移到了今建设路的位置,新开两门,靠北的叫“迎晖门”,靠南的叫“宜春门”;他加长了西城墙,在“金肃门”(明时先改称“阅武门”,又改称“振武门”)的北面,增加了一座“阜成门”。他把南城墙从今起凤街、铁匠巷的位置向南移了近百米,到了今迎泽大街北侧位置,新开两门,靠东的叫“太平门”,靠西的叫“朝天门”。他基本填平了流经今坝陵桥、城坊街的北沙河,把北城墙从今缉虎营街位置移到了今北大街位置,也开两门,靠东的叫“拱极门”,靠西的叫“镇远门”。

谢成扩建的太原城周长达到了24里,由“四门之城”升级为“八门之城”,尽管还不如晋阳城规模大,但已经是明朝的大型城池之一了。

这时,张永德修建的3座关城全部被收进大城之内。

明太原城的8座城门配套建设了8座瓮城。镇远门的瓮城比拱极门的瓮城大,朝天门的瓮城比太平门的瓮城大,所以镇远门俗称“大北门”,拱极门俗称“小北门”;而朝天门俗称“大南门”,太平门俗称“小南门”。而东城墙上的宜春门位置更靠近张永德修建的大东关、承担的军事卫戍任务也更重,就被民众称为“大东门”,迎晖门自然而然成了“小东门”。

西城墙上的振武门,地势比北面的阜成门更低,雨水连绵或汾水泛滥时更易于积水成涝,所以俗称“水西门”,相对较高的阜成门,就被称为“旱西门”了。两座西门外都建有河神庙,表明水西关水不少,而旱西关并不旱。

朱橞之后,第5任晋王朱申铉时代根据国内形势需要,又安排在朝天门外修建了“南关城”,在镇远门外修建了“北关城”。南关城面积大,城墙是砖砌的,俗称“大南关”;北关城面积小,墙体是土夯的,俗称“小北关”。

从此之后,两座东门、西门之外,明清两朝都没有修建关城。原因只有一个,谢成已经把东城墙修到高低不平的东山脚下,而西门逼近汾河,实在没有修建关城的足够空间了。

但是张永德修建的东关城深深铭刻在一方百姓的心中,随着大东门外人口的不断聚集,民间就把这个区域称之为“大东关”。

有的资料说:“大东关名称因地处明清太原城宜春门(大东门)外的大东关关城而得名”,是不准确的。

杏花岭名字的由来

“花花真定府,锦绣太原城”的说法由来已久,但不见史籍,应该源自宋元后北方流行的民谚。

但民谚,实际上比体现官府意志的志书,更能准确地反映当时社会普遍一致的认知。

如果分析起来,那时民众对河北真定府和山西太原城两城比较后得出来的判断,“花花”着重强调繁华,突出的是吃喝玩乐的体验;而“锦绣”则偏重夸耀美丽,赞赏的是赏心悦目的感受。

首先为太原赢得“锦绣”美名的,肯定是北宋时期颇有诗人气象的知府陈尧佐。

状元出身的陈尧佐,把理政也当成写诗。他在治理日渐严重的汾河水患时,先在汾河东堤和太原西城墙间的狭长地带深挖取土,筑起一道与东堤平行的新堤,在新堤旧堤之间掘出大面积洼地,然后引入汾河水,蓄成周长5里的湖泊,形成府城和汾河河道之间一个新开辟的巨大缓洪池,以备夏季发洪水时分流度汛。

接着,他又率领太原民众在新堤上植下万株柳树,不仅加固了堤防,还顺带营造出一派依依垂柳、丝丝柔条、团团粉絮的溪畔诗景。

太原人把老知府筑起的河堤起名“柳堤”,把新开辟的分洪池叫作“柳溪”,又在柳溪中植下田田莲藕,并在陈尧佐亲自修造的“形霞阁”东面新造了“四照亭”,再后来,又筑起“秋华堂”和“水心亭”。

一时柳枝影里,涌出多少楼台。“堤内荷开烟树,船头月照波光”,柳溪,成为河东太原府城最赏心悦目的锦绣图画。

宋后为太原美景锦上添花的是,明初在北宋府城基础上大规模扩建、新建而成的“崇崇雉堞,壮丽甲天下”的明代太原城。

此时陈尧佐老知府开创的大型园林水景“柳溪”虽已不存,但另两处园林景观与高耸的城堞危楼和巍峨的官阙庙堂联袂出现,似乎让太原城的“锦绣”面貌更加夺人心魄。

这两处皇家王府园林,一曰“松花坡”,一

曰“杏花岭”。

松花坡由于今日没有地名遗存,当年松柏含烟、山石叠翠的景象也已湮没在岁月尘埃之下。后人只能循清道光《阳曲县志》“建制图”和“街巷图”的指引,确定出它大致的位置,它紧靠“红四牌楼”,在今太原五一路以西、皇华馆以北、海子边东街以东的三角区域。

而杏花岭比松花坡更靠近晋王府,处在南华门的东南角,则是名副其实的王府私家园林。

与今天这一区域平坦如砥大不相同的是,明代松花坡包括杏花岭所在的地貌,仍是连绵东山向西延伸出来的余脉,地势崎岖而坡高壑深。那时松花坡的侧旁,还有“金鸡岭”和“桂子山”这样“山”“岭”的地名。

松花坡很大程度上还应该是野趣盎然的原生态林地,而杏花岭,则因为加入更多新的人工元素,成为晋王府贵胄出游的优选之地。

“杏花岭”得名,可能不像“松花坡”那样来自民间,而寄托着晋王朱橞的主观愿望。

山西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说,晋王朱橞为什么把他的王府园林叫作杏花岭,而不叫作桃花岭、梨花岭,这是因为杏花岭这个名称体现着朱橞浓浓的乡愁。

朱橞从南京来到太原,心里一定朝夕惦记着自己在金陵城的难忘时光,虎踞龙盘难再现,但“杏花春雨江南”的文化意象或可部分营造。

于是谢成或者朱橞根据太原物候,在晋王府南华门外的高坡上人工栽植出一片蓊郁杏林,以此抚慰远离“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的寂寞之情。

除了思乡,朱橞之所以把王府园林冠名“杏花岭”,还因为杏花积淀着中国人文理想的深厚内涵。

第一,杏花初开如火、盛开如雪,红而能白、娇容三变,蕴含无穷意趣。一年之间,这里可以春鉴花海、夏尝杏果、秋饮杏林、冬赏雪坡,花开烂漫、果熟垂金。一道杏花岭,可抵万首诗。

第二,杏花绽放在三春之中,代表着物色清妍、温暖宜人的明媚季节,“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被古人植入丰富的节俭意蕴和景致观感。唐宋以降,“杏花村”就已成为广泛社会认同的审美文化符号。

唐代长安的曲江,就曾植有大片杏林。武则天时代,所有新科进士都要按例在曲江杏园摆宴谢恩,然后至大慈恩寺塔下题名留念。“杏园欢宴”遂成为唐政治文化生活中一件盛事。

因此,盛唐官府和市井,都把杏园赏花视为富有品位的雅赏。杏花和杏林,也更牢固地成为仙、医、儒高尚人格的身份标识,赋予幸运之花和幸运之木的寓意。

对太原古城而言,“春色方盈野,烂漫开满城”,王府园林杏花岭,为太原城的锦绣面貌赋予美好而吉祥的文化寓意。

杏花岭绝代美景延续260多年后,至清顺治三年(1646),一场莫名大火焚毁了富丽堂皇的晋王府,失去依怙的杏花岭也逐渐荒芜。但到清中叶,杏花岭顽强地焕发出新的生机,坡上老杏新榆再次繁衍成林,再次成为太原城内罕见的大片林地。

日军侵占太原后,杏花岭林地惨遭灭顶之灾,坡上的林木很快被砍伐殆尽。

日军投降后,阎锡山的晋绥军又在这里修筑城防工事。解放战争时,昔日景观园林成为阎军抵抗人民解放军、困兽犹斗的炮兵阵地。

结 语

如今,杏林、杏花、杏果在这里已经难觅其踪,但“杏花岭”这个隽永的名字却化为“杏花巷”和“杏花岭街”镌刻在太原的记忆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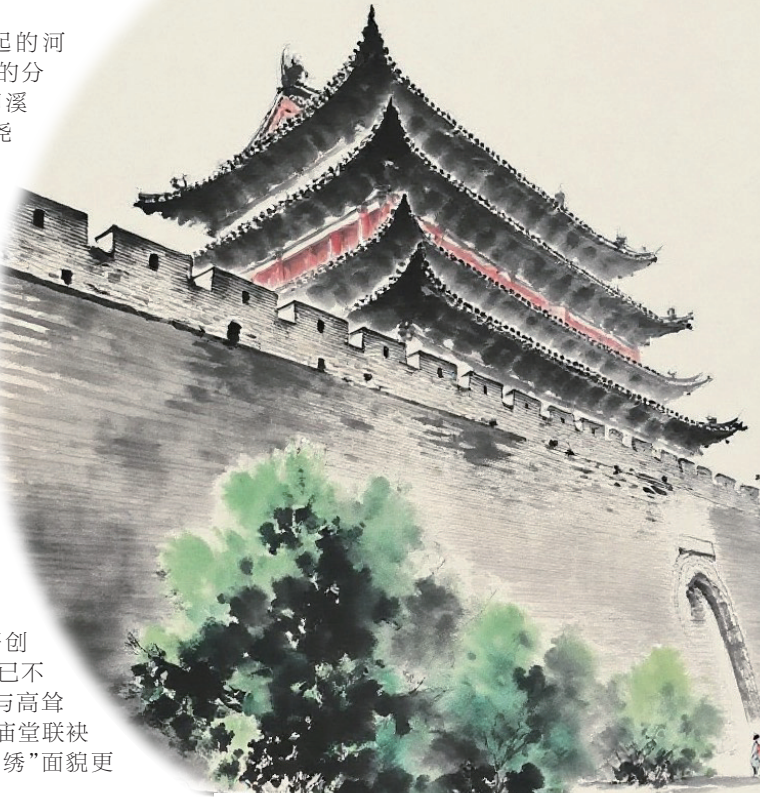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太原市一个城乡一体化的新区,即以“杏花岭”的名字命名,锦绣太原城这道绵延600多年的历史文脉,得到更明晰、更坚决,也更永恒的赓续。

住在杏花岭区的人们,于是重新开始憧憬什么时候这片土地会出现“杏花坡上杏花台,杏花台耸杏花阁,杏花阁饮杏花酒,杏花酒放杏花诗”的醉人景象,并相信,这一天一定会早日到来。

讲座地点:杏花岭区三晋文化大讲堂

主 讲 人:马绍民

时 间:2025年3月21日



拱极门(AI生成)

